

社会热点丛书

暴富



曙光 编著

大亮相

团结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改革开放时代,发家致富成为人们饭前茶后议论的热门话题。人们对自己身旁魔幻般出现的腰缠万贯的暴富阶层,或羡慕向往,或惊诧怀疑;或嫉妒愤恨;暴富者发迹种种邪火传闻,也给暴富阶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本文以凝重的笔墨揭示了改革开放给欲想致富的人们带来的历史机遇,暴富阶层崛起的过程,展现了暴富阶层争生存,图发展,求创新,谋开拓的精神状态及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生活情趣,他们的所思所想;涌动的浊流给后人留下的许多沉思,许多告诫;理论上有益而中肯的探讨,给人们以充实,以启迪;这里更多的是期待,是呼唤,欲想致富的人们莫回头,大胆地往前走……

1992/1/25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契机	(1)
1 回眸历史的烟尘	(1)
2 时代大震荡	(9)
3 贫穷的困厄.....	(21)
4 万里闯“禁区”.....	(24)
5 小平巧设计.....	(30)
第二章 百舸争流	(34)
1 骚动的“自由人”.....	(35)
2 揭开“红娘”的面纱.....	(63)
3 鼓起羞涩的皮囊.....	(71)
4 挡不住的诱惑.....	(84)
5 昔日囚徒重塑人生.....	(94)
6 茫茫西洋路	(103)
7 锈迹斑驳的古老形象	(118)
第三章 浊流涌动	(125)
1 投放诱饵的“导演”	(125)
2 税柱下的“白蚁”	(139)
3 人头攒动的黑市	(146)
4 神通广大的“魔术师”	(162)
5 伸进纯净世界的黑手	(174)
6 填不满的私欲	(196)
第四章 心境探秘	(213)

1 潇洒走一回	(213)
2 打翻的五味瓶	(233)
3 寻觅人间真情	(240)
4 膨胀的欲望	(243)
第五章 翘楚未来	(252)
1 莫忧虑莫徘徊	(253)
2 大胆往前走	(258)
3 群英荟萃	(263)
4 明日更明媚	(276)
第六章 呼唤真谛	(282)

第一章 历史契机

1. 回眸历史的烟尘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沉浮着许多富贵的传说。

旧富翁曾是革命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旧富翁彻底消亡。

建国初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公布后，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巨大反响，相当一部分进步人士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趋势，热烈拥护总路线，积极要求公私合营。他们庆幸自己企业接受国家加工已先进了一步，买了社会主义门票。

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绝大部分人没有思想准备，相当一部分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有种种怀疑、误解，把过渡时期说成是“过刀时期”，认为总路线是“杀鸡取卵”、“消灭私营工商业”，许多商业资本家惶惶不安，互相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总路线’找到没有？”

少数工商界人士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抵触对抗，说：“税收

加总路线——两个完蛋。”有的采用“加薪”、“借支”等手法变相抽走资金；有的把生产资料转为消费投资，修房买房，到社会主义落个好房子住；有的把社会主义改造当作“末日来临”，“迟光、早光、还是一光”，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有一个资本家结婚多年，已生了两个小孩，还到上海去补行结婚典礼。另一个资本家丢下商店不管，包了一个舞女，长居不归。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有的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拥护公私合营；晚上抱头痛哭，悔恨多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

从资产阶级这一阶层的状况来看，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他们留恋资本主义，舍不得交出企业。认为反抗执政党没有好处，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又怕失去现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怕生活没有保障，因此他们顾虑重重，惶惶不安，深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5年11月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这个决议，稳定了资本家的思想，他们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王一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痛苦斗争的结果。

湖北省的资本家王一鸣在汉口创建了胜新面粉厂,效益显著,是王氏父子两代奋斗的成果。在实行公私合营时,旧富翁王一鸣内心矛盾很大,脑海里展开激烈思想斗争,他认为共产党顾名思义就要“共产”,“共产”就要交出财产,迟交不如早交好。一想到要把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资产交出来时,心里非常难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中南局领导同志的帮助下,王一鸣经过学习,认识到公私合营对国家、工人、工商业都有利,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欣然同意胜新厂公私合营。

中华第一号资本家、全国头号富翁、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经理荣毅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经历无疑是最具有典型意义、最具有说服力的。

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上,荣氏家族曾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荣氏家族曾是中国工商界赫赫有名的“望族”之一。作为荣氏企业家的第二代,荣毅仁先生从30年代即投身于民族工业,成为中国拥有20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的大实业家。

1956年1月,在上海市私营工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的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荣毅仁先生。

当记者向他提出“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荣毅仁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

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

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都找荣毅仁，要他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他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他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假冒的资本家。他坦白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

他的父亲和伯父创办和发展自己的企业，是从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时期开始的。他父亲一辈人，梦想着办工业，救国图强。当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连年内战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民族工业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老一辈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身上，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对他们的第一手，却是无端通缉其伯父荣宗敬，向他敲诈了十万银元。1934年，当申新最困难的时候，荣毅仁的父亲以价值三、四千万的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并签订了借款500万元的合同。当时官僚资本家的头子宋子文想乘机挤垮申新，强制银行只付其280万元。直到抗战胜利，上海松沪警备司令部把他70多岁的父亲绑架扣押40多天，从中勒索了20多万美元作为赎金，才了结了这种事。

旧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涌来，中国民族工业面临破产。他父亲的实业救国理想破灭了。

解放前夕，他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几个弟兄有的跑到泰国办工厂，有的躲到了香港。其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从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盈利达到资本总额的1/4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申新”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

解放后的6年间，国家强盛了。这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他经常和共产党与人民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受到了政府的信任 and 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

作为旧富翁的荣老板不再存在，而作为新中国主人的荣毅仁以“红色资本家”的身份，活跃于新中国政坛。荣毅仁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1993年3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刘鸿生，这个被誉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业大王”的民族资本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1年为英商办的开平矿务局买办。1920年起，先后独资或与人合资开设苏州鸿生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中化煤球公司、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并举办煤矿、码头、仓库、银行、保险事业。1929年任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产业部分被敌劫，部分内迁。抗战胜利后，他的企业受到四大家族的排挤和吞并。新中国成立后，刘鸿生的企业

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刘鸿生表示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他在1956年9月对记者说：“你问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我是一个企业家，我的企业，无论水泥、毛纺、码头、火柴、煤矿、银行业目前都在发展着，规模远比过去大得多。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理想，这是我过去50年的梦想，我当然要拥护！解放后，我们家的资产和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今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私营企业的定息制度，私营企业的资方有5%的定息。我的章华毛纺厂和水泥业、火柴业、码头及其他企业已先后拿到定息。这笔定息的数字从我们的生活需要看来是相当大的。……我感到政府的照顾实在太多了。”

我拥护共产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资本家。现在我身体不好，不能陪你去黄浦滩头看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名式各样的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往往站在码头上摇头。如今呢，这一带地方的每个码头上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想想看：一个看过上海50年变迁的中国人，他心中会不高兴吗？”

看到新中国的强大，从旧时代富翁转变为新社会主人的刘鸿生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他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常务委员。

猪鬃大王古耕虞被称为“富甲天下，可与石崇媲美。”他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前，古耕虞是中国以及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1948年，他的猪鬃由四川畜产公司出口到欧美各国（包括当时各解放区委托人经销、代销的部分），占全国总出口量85%。古耕虞是位大富翁，拥有上千万美元的财产和资金。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香港回到北京，把自己香港、美国的公司和资财以及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司资财和一批出色的国际贸易人才、价值连城的商誉和“虎”牌商标，全部交给了国家。从此，中国少了一位旧富翁，多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

为什么这支红色老虎投靠党和人民呢？古耕虞回答说，理由可归纳三点：（1）最根本的一条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包括建国以后所采取的对民族资本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客观现实中，共产党的政策是爱国反帝的民族资本家所能够接受的。（2）企业家有所谓“企业心”。在他们身上，发财欲望和事业欲望往往混为一体，这是中外一致的。他们把自己事业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的创造，惨淡经营，百折不挠，不惜为之绞尽脑汁，倾注全力。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的事业欲望甚至会超过发财欲望。现在各国许多具有“创造狂”的、开拓型的、甘冒风险的企业家大概类此。（3）建国以后，共产党和政府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企业和个人改造相结合，理论、政策学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要求工商业者既对国家经济建设贡献才能，又能在政策上、业务上提出建议，同时，又对自己旧思想、旧习惯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古耕虞先后担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许多旧富翁弃旧从新，走上了光明之路，对此，原重庆川康兴业总经理兼董事长胡子昂感到莫大的光荣、无比的自豪；原天津利中酸厂经理万国权认为这是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的伟大胜利；原上海华明烟公司经理经叔平感激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政策，自豪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原上海大丰纱厂常务董事刘靖基感到盛世如花，前程似锦；原北京福兴面粉厂经理孙孚凌表示工商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国家的主人是其最大心愿，等等。

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大多数资本家由旧中国富翁、剥削者，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建国初最后一批旧富翁走向了新生。

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的旧式富翁消失了，一批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出现了。这正如中国大诗人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所写的：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2. 时代大震荡

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中国的百万富翁逾五千。

各种报纸、杂志相继报道：

广东一个体户一次就为其养殖业买了720万元的保险。

深圳的一私营企业老板拥有8部小汽车。

深圳一农民买了2000多万元的房产。

这些资料及一连串数字预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出现了超级富豪，出现了一个富翁阶层，迎来了一个震荡的大时代。

时下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万元不算户，十万刚起步，几十万立个户，上百万才算富。

中国是否应该重新出现富翁，举国上下仍在求索。但习惯了贫穷的人们尚未反应过来时，那些不甘于贫穷的人们都已

作出了新的选择。

先闯特区的人已致富在先，其生活状况很难用文字描述，一般人对他们的衣、食、住、行，只能望洋兴叹。

镜头之一：

杰尼亚——时髦的追求

京城衡量大款、富豪有三个不成文的标准：家有宝马车、身穿杰尼亚、手持大哥大。要是谁能穿上杰尼亚，准是人们眼中的“大款”。北京王府饭店里有个杰尼亚北京中心店，光顾这里并有回头记录的目前也不超过100多人。杰尼亚怎么啦？首先它的名气极大。杰尼亚与瓦萨斯、阿玛尼齐名，同为世界三大名贵时装之一。北京人熟悉的皮尔·卡丹、伊夫圣洛朗时装是设计师品牌，而杰尼亚则是具有近百年历史的企业品牌，以其适应潮流而略加古典化的名贵男装而驰名全球。世界大国政界要人曾身着杰尼亚在公众面前亮相，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英国查尔斯王子等。因此谁穿上杰尼亚，自然身价倍增，其次杰尼亚仗其昂贵闻名于世，说到杰尼亚服装的价格，素来被称为“贵族价格”，一套西装要价9000元，大衣、皮夹克皆是五位数的价码。这种价格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能望而却步，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也只有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人，才有资格享用。

正因为如此，杰尼亚在北京设店的最初设想是为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商社代表服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杰尼亚开门纳客后却爆发奇闻：这里的回头客最多是当年第一拨在秀水东街练摊而发达起来的款爷。当这些大款们在这里一掷千

金时，他们只求一条：高消费的刺激。

来自四方八面的消息：

1991年12月，意大利久负盛名的贝纳通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商业区开设了一家时装店。店里有种高档冬大衣、开价900元。相当于普通人月薪的三、四倍，但很快在几天内便脱销了。

享誉全球的法国“皮尔卡丹”公司在天津开办了合资工厂，生产的服装均为高档。这些服装在中国的大酒店和宾馆内销售，最低价格为1000元。结果表明，销售量沿直线上升。

北京的燕莎、赛特、友谊、西单等商场均以销售高档服装而著称，但每天购者络绎不绝、营业额居高不下。

所有这些证明同一个结果：大款们的购买率占总销售量4/5，而一般市民基本上是饱饱眼福而已。

广州一位姓王的个体户每时每刻都身着名牌，从上到下，由里向外，全身计价总得在万元左右。据说，他与他的太太一年光用在服装上的开销就高达几万元之巨。

《民族文化报》有一则写真报道：

1993年初的一天，北京一家以经营高档、新奇名牌时装为主的商场刚刚开业不久，一辆奔驰600便在商场门口嘎然而止。从车上下下来一男一女，男的40多岁，身穿“左丹努”西服，脚蹬“烟斗”牌皮鞋，手戴了枚粗大的金戒指；妙龄女郎20岁光景，一件高档裘皮大衣裹住窈窕身材，一身的法国香水弥漫了商场的空间。当这二位相拥而入时，人们不禁驻足观望。

男士戴一幅大大的墨镜，目不斜视，径直奔向最高档的时

装大厅，“有刚来的名牌套裙吗？”男士开口就问。

导购小姐彬彬有礼地将他们带到一个时装模特身边，向男士介绍说：“如果是这位小姐穿的话，这身意大利最新款式怎么样？”

“就要这身。”男士瞟一眼写着“1700 美元”的标价，一边让摩登女郎去试穿，一边随手从兜里取出一叠面值为 100 美元的钞票。

末了，男士问：“没有再高档一些的了？”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只好委屈地凑合穿着走了。

导购小姐介绍说：“100 美元一双的袜子，1500 美元一套的西装，10000 美元一个的戒指，……这些令普通百姓咂舌的高价商品销路看好。比如刚才这位就是附近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大款，在开业第一天就带时髦女郎来选购最“派”的时装。

问：他经常来吗？

答：经常来，有时三五天就来一次。

.....

大款们在穿戴上独领风骚。他们认为越贵的东西，就越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越能标榜自我的地位。他们不但自己的穿戴讲究，而且还把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

入夜。武汉一家比较气派的卡拉 OK 厅里热闹非凡。此刻一位颇具风度的大款携带他那年轻貌美的太太走了进来。男士全身名牌自不必说，那位太太更是神彩奕奕，身上是珠光宝石的连衣裙，脚穿一双高贵名皮鞋。而耳下面垂着一对漂亮的金耳环。左右手分别戴着三枚和二枚戒指，还另配一对翡翠手

饕，真可谓“身价连城”，在场的人无不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镜头之二：“这里不欢迎不速之客”。

说到此，可要归功于我们的祖国。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发达的饮食文化，譬如在古代从君王至尊到布衣百姓都有着独特的吃法。君王有君王的吃法：饮酒总有佳肴和美人，歌女吟唱、舞女飘逸、侍女立于两侧。多美！正所谓“饮酒作乐”；布衣百姓虽不及君王贵族讲究，但同样自得其乐：二两烧酒，一碟菜，口里哼着小调，海阔天空的神侃、要是碰上知己，扯着嗓门就猜码。难怪今天的影视界在制片时，总是忘不了加入“吃”这一情节，似乎无“店”、“无铺”、“无酒”不成戏。国人继承了这一文化，而在大款们身上更是发扬光大，即便是过去的君王，面对大款们的吃，也只有望其项、指其背的份儿。

长沙有个远近闻名的饭庄，取名“天心炸鸡店”。它以味美价高著称。每天来这里的食客门庭若市。一年 365 天，天天如此。若想在店占一席之地，非提前一个星期预订不可。“天心炸鸡店”不欢迎不速之客。据负责人介绍，食客中除少数人是吃公款的外，大多数是有钱作东，或者当地的款爷、或者外地的富豪。笔者受朋友之邀，去此地倒是领略了一番风光，既饱了口福，又饱了眼福。进得门放眼望去，桌桌坐着食客，服务小姐来回不停地穿梭、上菜添酒。有的全家三口占一席，有的几个同事同桌，有的老中青三结合，形形色色，可谓食客满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桌面上绝少留有空档，一是喝的都是名酒。我的邻座是位打扮入时，一眼就能断定是相当有实力的